

纪念莫友芝诞辰200周年
暨遵义“沙滩文化”学术研讨会

论 文 汇 编

二〇一一年六月

贵州·遵义

纪念莫友芝诞辰200周年
暨遵义“沙滩文化”学术研讨会
论 文 汇 编

二〇一一年六月

目 录

崇尚科技，盛赞铁路

- 沙滩派与现代科学技术····· 施吉瑞 1

- 莫友芝書目宋元舊本互著情况初探····· 陳煒舜 16

- 从《双鱼罍斋录莫子偁友芝集联》看莫友芝诗学取向····· 郑永晓 32

道台与地方政治

- 以黎庶昌为个案之研究 1891—1895 ····· 苟德仪 41

- 论莫友芝诗歌“真”的审美特征····· 周 芳 59

- 郑珍山水诗的艺术风格及其变迁····· 罗筱娟 66

本是同根生 花开俱馨

- 写在莫友芝诞辰200周年 ····· 李性刚 73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 浅论莫友芝山水游记的内在精神····· 任在喻 95

- 论郑珍的诗学观与其创作的关系 ····· 牛贵琥 99

本土型·群体型·创新型

- 沙滩莫姓儒学与贵州本土儒学的形成····· 陈 奇 陈 瑜 105

- 莫友芝与丁日昌的《持静斋书目》····· 张燕婴 109

君看入品花，枝干必相异

- 论郑珍的“真我自立”····· 赵 玲 崔瑞萍 114

- 莫友芝的词与词论····· 赵 玲 121

治学游艺 书学融通

- 莫友芝书法专题研究 一 ····· 隋邦平 126

重探《說文·木部》的真偽問題

- 從口部殘卷與《篆隸萬象名義》的比較談起····· 許明德 133

- 论莫有芝诗风之转变····· 诸葛忆兵 142

走进“西南巨儒”的心灵世界

- 莫友芝《影山词》简论····· 刘扬忠 郑 丹 150

- 莫友芝为诗路向的体制分殊····· 易闻晓 157

- 郑珍“学人诗”的学韩路向····· 易闻晓 169

读刘毓崧《唐元和写本说文本部笺异跋》·····	黄耀堃	181
莫友芝的目录学实践及功用·····	陈琳 孙晓竹	190
略论莫友芝山水风物诗的历史文化意蕴·····	周健自	195
质朴与华艳		
——郑淑昭闺阁诗刍议·····	张惠	201
郑珍对王守仁表彰《古本大学》的表彰·····	王晓昕	209
近代学人杨守敬的学术成就·····	杜景	221
莫友芝搜求地方文献和校勘大型史书的巨大贡献·····	黄江玲	226
论“沙滩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黄万机	232
莫友芝与茶文化·····	刘一鸣	239
近三十年“沙滩文化”研究成果·····	龙先绪	242
张之洞与郑珍父子的一段情缘·····	罗晓萍	245
莫友芝考据学思想绎析		
——以《邵亭知见书目》为中心 摘要·····	汪启明	249
温水考		
——郑珍夜郎研究之再研究·····	王德坝	250
莫友芝《黔诗纪略》逃禅出家人物述评·····	王路平	257
论莫友芝《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在版本目录学上的成就·····	谢敏	267
郑珍与郑玄的经学渊源·····	曾秀芳	271
莫姓家族与贵州儒学的传播及民族认同·····	朱松华	277
莫友芝的诗与文·····	曾祥铤	281
《〈邵亭诗钞〉笺注》质疑·····	公犊	288
莫友芝给我们的启迪·····	刘明远	297
莫友芝先生《撞铎行》诗解读·····	李永林	300
莫友芝先生墨宝·····	李永林	302
评莫与俦的毋敛考·····	禹明先	305
莫与俦对沙滩文化的影响·····	黎铎	311
试论郑珍的人格特点·····	张嘉林	316
走出贵州山门、睁眼看世界的黎庶昌		
——以《西洋杂志》为例·····	林建曾	321
莫友芝笔下的酒文化·····	周山荣	326

崇尚科技，盛赞铁路

——沙滩派与现代科学技术

J. D. Schmidt 施吉瑞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关于现代西方科学技术的论述起始于五四运动。该观点的形成大概要归结于五四运动中最流行的口号“赛先生”(Science 科学)和“德先生”(Democracy 民主)。而提出这两个口号的人就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后来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1879—1942)。¹虽然有关科学技术的争论在五四运动时期变得更为激烈，但是早在曾国藩(1811—1872)倡导的“洋务运动”使中国跟西方科学重新建立起接触之前，中国文人对科技的思考其实早已存在。在十九世纪的中国，关于科学的著述已经比较普及，特别是在沙滩派的作家中，科学更受到格外关注。沙滩派的作品不仅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很有意义，在以科学技术为题材的诗歌和散文中，沙滩派的作家也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他们崇尚并推广所谓“宋诗派”的主张，即精品诗是“诗人之诗”和“学人之诗”的综合产物。该观点贯穿于沙滩派所有关于知识和科学的作品之中。²

郑珍(1806—1864)是沙滩派的代表诗人，他对与之有关联的郑、莫、黎三家的文人都有很大的影响。早在1835年，郑在为儿子“知同”(1831—1890)的周岁生日所作的诗里，就已流露出对数学的研究和兴趣。下面这首诗描绘了其子抓周时的情景。

“抱持不可律，爬按随掀翻。乃左持古籀，右手持天元。大笑真吾子，此意甯非天。”³

¹ 陈独秀的生平参见 Howard L. Boorman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vol. 1, pp. 240-248. 陈独秀的民主科学思想发表在1919年1月《新青年》月刊。英文翻译参见 Chow Ts' 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59. 陈文中的“赛因斯”和“德莫克拉西”是根据英文的“science”和“democracy”音译而成。

² 参见吴淑钿，《近代宋诗派诗论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107-116页。

³ 郑珍，龙先绪 编辑，《巢经巢诗钞注释》，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前集”，卷2，60页，“阿卯晬日作”。

初读此诗，人们很容易了解郑知同为什么对古籀有兴趣，那是因为耳濡目染，受其父亲的影响。当时，在历经湖南浯溪之行后，郑珍正潜心研习古籀体，力图自创一种新的书法。而掌握籀文对他理解和诠释古典文献是必不可少的，他的老师程恩泽（1785—1837）也希望他能精通词源学。⁴可是，大多数读者可能会忽略郑珍对数学的爱好，因为“天元”听起来好像是道教那些探讨宇宙神秘的深奥天书。其实，“天元”是代数学上的一个名词，用来解一元多项方程式。⁵ 尽管在宋代和元代，这类中国代数曾达到顶峰，但到了清代，学者们又重新对这类数学产生了兴趣。其中阮元（1764—1849）的好友焦循（1763—1802）就曾撰写了两卷关于一元多项方程式的著作《天元一释》。⁶

古典诗词的读者一般不习惯诗人把数学当成他们生活中的主要灵感之一。可是如果有人怀疑郑珍对数学的兴趣，那就请看诗人在同一首诗中写的另外两句：“立成具推步，不用咼与蕃。”⁷ 由于郑的这两句诗引用了天文和数学用语，而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亦很少提及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所以对这两句诗，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解释。

从字面意思看，上句（立成具推步）的意思是“数学用表可用于推算日月星辰的转运（历法）”。根据清朝末年在敦煌石窟发现的《立成算经》，“立成”这一术语早在唐朝已经出现。《立成算经》里罗列了乘法口诀表，得数分别用数字和中国数学古籍中常见的算筹表示。⁸ 可是，郑珍在写这两句诗时，《立成算经》还未被发现，所以，郑珍提到的一定是另一个更复杂的数学表。贾宪（约 1100）的《立成释锁》已经有这种表。虽然这本书已经失传，但我们知道这本书里贾宪研究了一种类似“帕斯卡三角形”的数字三角，即后来我们称之为“二项式定理”。⁹ 中国现存的最早的关于“帕斯卡三角形”的研究出现于杨辉 1261 年撰写的《详解九章算

⁴ 浯溪因有唐代诗人，书法家元结（723—772）的书法而出名。程恩泽是晚清宋诗派的两名发起人之一，沙滩派亦属于此。

⁵ “天元”一词的来源和有关著作参见 Jean-Claude Martzloff, *A History of Chinese Mathematics*,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verlag, 2006, pp. 258–271 和 Benjamin A. Elman, *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190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60.

⁶ 焦循的生平参见 Arthur W. 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pp. 144–145.

⁷ 郑珍，《巢经巢诗钞注释》“前集”卷 2，60 页。

⁸ 参见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3, *Mathematics and the Sciences of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9.

⁹ 参见同，pp. 134–137.

法纂类》。该书在清末重新被发现，所以郑珍极有可能接触过这本书。¹⁰ 即便不是这样，郑也一定接触过清初中国最重要的数学家梅文鼎（1633—1721）的关于历算的著作，其中也有类似的数学用表。¹¹ “推步”这个术语跟“立成”一样，在中国也具有悠久的历史，十八世纪中期江永（1681—1762）撰写的著作题目就是《推步法解》，而这与郑珍的时代很接近。¹²

下一句诗提及的“咼与蕃”指的是天文数学家王蕃（三世纪）和祖咼之（480—525）。三国时期的王蕃曾在吴国入仕，他计算了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并算出了比较准确的圆周率值。¹³ 祖咼之曾在梁朝和齐朝做官，他发现了“祖咼原理”，即“二立体等高处截面积均相等则二立体体积相等”的定理。该原理在西方被称为卡瓦列利定理 (Cavalieri's principle)，以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利 (Bonaventura Cavalieri, 1598–1647) 的名字命名。但中国人比意大利人早 1100 年发现了这一原理。祖也确立了更加准确的圆周率值。¹⁴ 在阮元主编的关于中国数学天文史的巨著《畴人传》中，对王和祖都有详细的介绍。该书在阮元的主持下由诸多学者从 1797 年至 1799 年共同编撰而成，很可能在郑珍年轻时曾流传于贵州。¹⁵

郑珍对数学的爱好在他那个年代并不算罕见。郑有可能读到过前文提及的比他早一个世纪的江永的作品。江永的知名门生——哲学家戴震（1724—1777）和另一位郑应该熟知的大汉学家钱大昕（1728—1804）都曾写过大量的关于计算天文学的

¹⁰ 参见同，p. 41. 关于宋元数学古籍发现的记载，特别是杨辉的著作参见 Elman, *On Their Own Terms*, pp. 250–254, 杨辉的部分见 p. 252.

¹¹ 参见《大统历志》梅文鼎部分的序。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提要”，2a 页，在《四库全书》珍本二集。关于“推步”和“历成”术语的解释以及梅的数学用表参见同，卷 1, 12 页。关于梅文鼎和其他清代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的研究，参见刘洪涛，《数算大师—梅文鼎与天文历算》，沈阳：辽宁文学出版社，1997.

¹² 参见同，p. 456. 江永还写了《数学》一书。古称推算历法为“推步”，意谓日月星辰运转于天，犹如人的行步，可以推算而知。

¹³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3, p. 100. 王蕃的文章见严可均编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第 2 册，“全三国文”卷，72 页，1439–1444 页，“浑天象说”。王蕃的生平见阮元编辑的《畴人传》，卷 5，吴，67–69 页，在《葛有文庫薈要》vol. 1004–1010.

¹⁴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3, p. 101. 祖咼之的生平见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3，卷 72，“列传”62，“文学”，1774 页，和阮元的《畴人传》，卷 9，梁，107–109 页。

¹⁵ 参见 Elman 的论述，*On Their Own Terms*, pp. 250–254, 以及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 in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64–65. 有关阮元接受西方科学与数学的研究参见黄爱平“从《畴人传》看阮元的西学思想”《清史研究通讯》3 (1989)，15 和 55–59 页。

书籍。¹⁶ 事实上，自梅文鼎之后，天文学和数学就成了中国文人们热衷的探究领域。¹⁷ 很明显，郑珍也与时俱进。他的两句诗明确告诉我们，最新的数学发现已经取代了“咂与蕃”的数学“经典”。除了具有历史研究意义以外，“咂与蕃”的著作应当归入“不用”之列了。

那么，郑珍是否了解当时的西方数学——这个被认为是改造了西方世界的科技革命的基石呢？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假若郑珍看过阮元的《畴人传》，他就可能会阅读到关于外国科学数学家简短的、不甚清晰的介绍，例如，希腊几何学家欧几里德（Euclid, 约前 300）、曾主持编写亚而封所表（Alfonsine tables）的卡斯蒂利亚（Castile）君主——亚而封所王十世（Alfonso X, 1221—1284），还有现代天文学之父歌白尼（Copernicus, 1473—1543）等。当然，他还会看到一些更详细的关于耶稣会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的记载，这些耶稣会成员给明末清初的科学带来了深远影响。¹⁸ 然而，就象大多数与郑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郑珍大概对重新被发现的唐、宋、元时期的代数著作更感兴趣，这些著作在明朝被忽略并近乎失传，而明末清初从西方传入的数学也并不比这些著作中所论述的内容更先进。而且，自从 1715 年教皇克勉十一世（Clement XI）公开指责中国礼仪，康熙帝就禁止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西方科学和数学知识向中国的传入也就此中止；1723 年之后，再没有新的数学书籍介绍到中国。¹⁹ 因此，郑珍和与他同时代的人是无从了解牛顿（Isaac Newton, 1643—1727）和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 1646—1716）对微积分的发明与应用的。这一极大地推动了西方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新数学理论，中国读者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才有机会接触到。²⁰ 毋庸置疑，如果郑珍当时能接触到微积

¹⁶ 到十九世纪，在通俗小说中也能见到数学知识。参见由李汝珍（约 1763—1830）撰写的对十九世纪初小说《镜花缘》（约 1821—1828）中女性人物的数学爱好的评论。该评论见于 Elman, *On Their Own Terms*, pp. 275—278.

¹⁷ Elman, *On Their Own Terms*, pp. 275—278.

¹⁸ 参见阮元《畴人传》卷 43 “西洋” 1, 553—555 页。虽然所有中国的数学天文学家都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但西人亚而封所王排第一，其后是歌白尼，然后才是欧几里德！但是关于哥白尼的记述却不甚清晰。因为它既记载了哥白尼正确的日心说理论，又有误导性的记载，即 Tycho Brahe (1546—1601) 对太阳系的解释。这一体系是由德国耶稣会学者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汤若望, 1591—1666) 灌输给毫无疑心的中国人的。参见同., 554 页, 和 Elman, *On Their Own Terms*, p. 84.

¹⁹ Elman, *On Their Own Terms*, p. 180 和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 p. 38.

²⁰ 第一个掌握微积分的中国学者是李善兰 (1810—1882)。1852 年他到上海协助伦敦传教会的教士将科学著作译成汉文。其中就有 Elias Loomis (1811—1889) 的《代微積拾綴》，第一部中文微积分书。和郑珍相似，在接触西方传教士之前，李善兰也曾研究过宋元代数。和沙滩派的其他几位学者一样，李也作过曾国藩的幕僚。曾国藩曾出版过李的著作。李的生平参见 Hummel, *Eminent Chinese*, pp. 479—480 和 Elman, *On Their Own Terms*, pp. 298—299 and 301—308.

分，他一定会对此极为感兴趣，因为他的诗句表现了他对数学发展的敏锐嗅觉，但只可惜郑珍当时接触不到这一数学理论。

虽然我们没有更多篇幅来进一步详细研究郑珍对科学技术的兴趣，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郑珍早期对数学的爱好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他却在早年就致力于一个更重要的议题，即如何利用技术来改善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这一点在郑珍 1829 年所作的“播州秧马歌”中就可窥见一斑。在这首诗里，郑珍描绘了一种可以用来增产并改善普通农民生活的设计新颖的农业机械。²¹ 实际上，郑珍在 1837 年发表的第一本书《樗茧谱》并不是诗集或文集，而是一本关于养蚕的著作。该书讲述了饲养樗蚕（也称椿蚕，山蚕）的技术，这一技术给郑珍的家乡贵州带来了农业生产上的革命。郑的挚友莫友芝（1811—1871）共同参与了此书的完成，他为郑典雅的文字作评注，以便让普通读者能看懂。

郑珍最感人的科学诗创作于 1859 年，这也是他第二首写为预防天花而给其孙子种痘的诗。²² 在这首惊人的作品里，既有慎密严谨的医学解读，又有细腻入微的临床描写；同时，在情感上亦情深意切，感人至深，因此真正达到了宋诗派所主张的“诗人之诗”和“学人之诗”完美结合的最高境界。

但是，郑珍的科技诗并没有到此为止。他又开始思考一些对于我们理解现代科学技术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至今仍在争议之中。例如，1836 年郑珍曾到访过云南者海地区，并作诗三首，叙述了当地严重的铅工业污染问题。这三首诗证实了在西方技术传入之前，中国就早已有工业废地，而现代工业非人化的特质也早就昭然若揭。²³ 郑珍另一篇更出色的作品是他 1843 年写的长诗“吴公岭”。和其他作品一样，这首诗探讨了新兴技术（此处指筑路技术）是如何总是让富人和权贵们受益，而广大民众却只能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²⁴ 让人更为惊奇的是，在创作这些作品时，郑珍并不了解那些已经改变了中国与外界的关系并最终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西方科技。所以，在很多方面，郑珍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个体，尽管他毕生都没有接触过那些被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是现代性(modernity)发展之根本的西方文化和技术。

鉴于这种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比郑珍更长寿，并有幸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逃离了故乡混乱局面的沙滩派的其他成员能很快就适应当时已传入中国的

李也是一个有才华的诗人。李的诗歌散文注解及其白话译文见陈亚兰 所编《李善兰华蘅芳詹天佑诗文选译》，成都：巴蜀书社，1997，1-29 页。

²¹ 郑珍《巢经巢诗钞注释》“前集”卷 1，36-37 页“播州秧马歌”。

²² 同，“后集”卷 4，534 页“玉孙种痘两首”其一。

²³ 同，“前集”卷 3，124 页，“者海铅厂三首”。

²⁴ 同，“前集”卷 6，238 页，“吴公岭”。

新兴科学和技术。以莫友芝为例，他 1861 年成为曾国藩的幕宾，并很快开始阅读新近翻译的各类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文献，其中包括著名天文学家赫谢尔（John Frederick William Herschel, 1792-1817）撰写的 1851 年版的《谈天》，还有由当时活跃在上海的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编辑的《地理全志》。²⁵ 1862 年二月十一日莫友芝在日记中对中西的数学发展作了精简记述；从中可以看出，尽管最初莫对西方科学有所保留，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西方科学的实际应用价值，他甚至还开始研究微积分。²⁶

但这一期间，给莫友芝带来最大变化的是 1865 年他的首次上海之行。虽然莫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西方军队对该地区的破坏感到震惊，但让他大开眼界的却是丁日昌（1823-1882）安排他参观的江南制造总局，这是当时东亚最大的西式工业企业。²⁷ 这次参观留给他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至于他决定把长子莫彝孙留在制造局工作，以学习数学（微积分）、制造业和外国地理。²⁸ 因此，在郑珍去世后仅八个月，当时沙滩派的最重要成员之一就把儿子送到了西式工业企业工作，学习现代的科学和技术。人们可能很难想象，像莫友芝这样一个来自僻远的贵州地区的文人会走出如此激进大胆的一步。然而其挚友郑珍对科学的爱好，以及他后来与曾国藩及其周围的人交往，还有对江南制造总局的实地考察都显然促成了他这一睿智的决定。

铁路之争

即使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一部分中国文人官员就已经表现出对西方某些科学技术的赞赏。阮元曾写道，

“西人熟于幾何，故所製儀象極為精審。蓋儀象精審，則測量真確。測量真確，則推步密合。”²⁹ 西法之有驗于天，實儀象有以先之也。”

³⁰

²⁵ 莫友芝《邵亭日记》239 页，见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8。并参见 Elman, *On Their Own Terms*, p. 296. 关于慕维廉在中国的经历见同，317-318 页。

²⁶ 关于这些著作的题目见同，479 页。莫友芝《邵亭日记》263 页。

²⁷ 莫友芝《邵亭日记》，362 页。

²⁸ 同，362 页。

²⁹ 关于“推步”术语见上面。

³⁰ 阮元《畴人传》卷 45 “西洋” 3，595 页。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以及惨败之后，中国禁烟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林则徐（1785-1850）就劝告清政府要“师夷”。但直到咸丰皇帝继位之后，在曾国藩的领导下这些建议才真正受到重视。³¹

此时，即使是清廷的保守派也勉为其难地承认掌握某些西方军事技术是必要的，这样可以用来应对外敌入侵并镇压那些危及朝廷的诸多叛乱。可是，他们却不想有太大的改变，铁路之争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为了促进贸易，西方商人急于打开中国门户，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一旦控制了象上海这样重要的港口，他们就很快意识到修建通往内陆的铁路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

可是，当时没有几个中国人会和西方人观点一致。1865年，在郑珍去世两年以后，第一个提出要在中国修建铁路的人是史蒂文森爵士（Sir Rowland Macdonald Stephenson）。他是在英属印度修建铁路的先驱，他曾劝说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李鸿章（1823-1901）修建数条铁路，并表示可以提供修路贷款。³² 但当时，腥风血雨的太平天国起义才平息了一年，李鸿章认为时机不成熟，所以没有同意。因此，在中国土地上建第一条铁路又往后推迟了十一年。1876年六月三十号由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主持修建的从吴淞口到上海的四十公里长的铁路终于开通了。³³ 西方投资者之所以能修成这条铁路，还是靠耍了一个花招。因为他们很清楚清政府仍然强烈反对铁路建设，所以在向地方政府申请时他们只说要修一条从海边到上海的“路”，而并没有说明这条“路”将以铁轨铺陈并会有钢铁的火龙奔驰其上！出乎意料的是，当地中国民众对铁路一开始就表现出欢迎的态度。火车很快就满载着货物和乘客往返于上海的主要码头和市区之间。为了享受新的体验，很多民众都去乘坐火车。由于火车可以把货物从大型蒸汽轮船停泊的港口（吴淞口）快速地运送到销售地，铁路对上海的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修铁路也自然是一项有利可图的投资。

可是麻烦终于出现了，1876年火车撞死了一个人。担心这一事件可能会影响当时中英双方正在进行的谈判，英国驻中国大使威妥玛（Thomas Wade, 1818-1895）下

³¹ 见林庆元《林则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245-255页；和杨国桢《林则徐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217页。

³² Peter Crush, *Woosung Road, the Story of China's First Railway*, Hong Kong: The Railway Tavern, 1999, p. 4. 关于史蒂文森推动印度的第一条铁路建设，即东印度铁路，见 Aruna Awasthi,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Railways in India*, New Delhi: Deep & Deep Publications, 1994, pp. 18-20 and 38. 英国的铁路热激发了史蒂文森在亚洲修铁路。

³³ 西方的关于这条铁路的最全面的研究见于 Peter Crush, *Woosung Road*. 并参见杨勇刚，《中国近代铁路史》，上海：上海书店，1997，11-12页。关于这期间的铁路争论见同，6-10页和15-18页。

令在谈判结束之前停止铁路的一切运行。³⁴二十四天以后，中英双方签订了《烟台条约》。清政府不喜欢这条铁路，所以施加了大量外交压力，迫使铁路业主在十月二十四号以成本价将铁路售于中方。十二月二号，铁路在清政府分三次付清收购款项后又重新通车。尽管重新运行的火车满载兴奋的乘客，尽管洋商们也极力游说清政府让铁路继续运行，可是，1877年十月二十号这列火车还是完成了它最后的一次行驶。数日后，中国工人将铁路全线拆掉，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就这样灰溜溜地骤然退出了历史舞台。³⁵

尽管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机会游历那些新技术盛行的国家，但是反对铁路建设的情绪在中国却蔓延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刘锡鸿（举人，1848）就是反对铁路建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中国第一个在西方设立的常驻大使馆的二号官员，1877年开始任职于英国，第二年到德国出任大使。³⁶派刘锡鸿驻任英国是为了制约当时驻英国大使郭嵩焘（1818—1891）。有人认为郭有过度亲西方、急于改革的倾向，所以不能完全信任。刘让郭在英国的日子确很不好过，他还向朝廷递送了不少有关郭的“莫须有”的恶毒报告。³⁷

在刘出使英国的第一年，他就有很多机会体验到现代西方科技的优越性，比如，乘坐汽轮从中国到英国，多次乘坐火车，甚至还参加过电力和其他科学产品的展示会。³⁸刘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些先进的科技在西方国家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但他认为这些革新给中国却只会带来麻烦：

³⁴ Crush, *Woosung Road*, pp. 52-58.

³⁵ 同，pp. 95-103.

³⁶ 刘的任期和官职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季中外使领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5，3和9页。刘的遗作参见《刘光祿（锡鸿）遗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88，在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no. 446。他在德国任职期间的文档收录在刘锡鸿《驻德使馆档案钞》，台北：学生书局，1966，2 vol. 目前关于刘锡鸿的唯一专著见张宇权，《思想与时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刘锡鸿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潘光哲对该书作了中肯的书评。潘光哲，“书评”，《汉学研究》23.1（2005年6月），509-513页。

³⁷ 见刘锡鸿，《英轺私记》，长沙：岳麓出版社，1986，22-26页“郭嵩焘的死对头”和J. D. Frodsham, *The First Chinese Embassy to the West, The Journals of Kuo Sung-t' ao, Liu Hsi-hung and Chang Te-y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4, pp. xlvi and lx. 驻英使团秘书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 1833-1906），曾在他的日记里对刘有过颇为讥贬的描述。见Demetrius Boulger, *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 K. C. M. G. Commander of Li Hung Chang's Trained Force in the Taiping Rebellion, Founder of the First Chinese Arsenal, for Thirty Years Councillor and Secretary to the Chinese Legation in London*, London and New York: John Lane, 1908, p. 267. 郭嵩焘曾提携过刘，但是在朝廷关于西化的辩论中两人的观点对立，从此关系破裂。见刘锡鸿，《英轺私记》，12-16页。

³⁸ 参见刘的日记。刘锡鸿，《英轺私记》65“观电学有感”，127-129页。

“英公使威妥玛在都初相见时，辄言政在养民，当以开煤铁矿，创造铁路为中国目前急务。”³⁹ 此次由天津南下，同舟洋人立论，亦专主于此。⁴⁰ 余以中国立教尚义不尚利，宜民不扰民之说晓之。伊辈辩论往返，殊不惮烦。初不知其何乐于中国之富强，而进言恳切若此？

及抵上海后，于初十日往观格致书院。冯观察示以洋人所献铁路一图，由五印度取道关外以达京师，自北而南竟成一线。⁴¹ 始知其心非犹占埠通商之故智矣。当轴若不立意坚拒之，则海疆办事诸人喜新悦奇，将中其阴谋而不知悟。

窃谓吾人持论，当直言铁路之造，不惟有害于中国，并有害于英。盖百姓此时愤心未平，一旦创造铁路，复毁其田庐坟墓，则众怒益甚。⁴² 而伏莽之贼，遂得借共杀英人为名，因众心以作乱。不惟沿海商贩地方被其蹂躏，且径达印度之铁路，亦适足以资贼用。

我中国历代圣君贤相，才智非逊于西洋，而卒无有刳天剖地，妄矜巧力，与造化争能，以图富强者，盖见理深而虑祸远，非如英人之徒知计利。”⁴³

³⁹ 西方关于威妥玛（1818-1895）在中国活动的最详细的研究见 James C. Cooley, Jr., *T. F. Wade in China: Pioneer in Global Diplomacy (1842-1882)*, Leiden: E. J. Brill, 1981.

⁴⁰ 郭与刘经运河从北京到天津，然后乘汽轮到上海，再转乘另一艘汽轮到英国。

⁴¹ 刘在十月初十（公历 11 月 25 号）到上海，正好是淞沪铁路重新开通的前十天。这所学校的英文名字是 Chinese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and Reading Room。这所学校是在 1874 年由翻译家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和徐寿（1818-1884）建立。该校图书馆的很多藏书现在收藏于上海图书馆。见 Elman 的论述，*On Their Own Terms*, pp. 308-310。Elman 也提到了刘锡鸿的到访，特别是他对实用科学知识的蔑视。他认为这些知识都在中国学者之下。冯焌光（举人，1852，1877 卒），广东省南海人，曾任苏松太道的道台。其办公地点在上海。冯也极力反对建铁路。由于冯在任道台前，从 1864 年就开始管理江南制造总局，长达十三年，所以他对铁路建设的反对就比较难解释。他的反对似乎不是出于技术原因，而是为了捍卫中国主权。其生平参见 吴馨和姚文枬，《上海縣續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1918 版，第二册，卷 15，“名宦”，3b-4a 页，826-827 页。冯在江南制造总局的情况参见 Thomas L. Kennedy, *The Arms of Kiangnan: Modernization in the Chinese Ordnance Industry, 1860-1895*,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78, pp. 81-85。该书强调了冯支持建造汽轮和技术革新。在与刘会面后不久冯便去世了。因为冯的父亲在被发配到新疆后死亡，冯当时正从新疆扶灵返回。

⁴² 保守派反对铁路建设的另一个理由是铁路破坏了沿线的风水。

⁴³ 刘锡鸿，《英轺私记》，1986，48-49 页，“始论铁路”。该文的翻译见 Frodsham, *The First Chinese Embassy in the West*, pp. 110-113.

刘锡鸿反对铁路的激烈言论至少部分是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为了保住淞沪铁路不被拆毁，威妥玛正向北京施加压力，而怡和洋行的代表们也为此事去找郭嵩焘为其说项。而此时郭正和刘一起从北京出发，取道运河，一站一站地前往中国北部的重要港口天津，再乘汽轮由上海出发去英国。⁴⁴当然，中国的担忧也是合理的。当时，西方正计划修建从东印度延伸至北京的铁路网，铁路自然可以快速地将中国军人运往前线去保疆卫国，但同时也可以被入侵外夷所利用。另外，铁路建设本身也可能造成社会的动乱。反对铁路建设的另一个理由是铁路会使大批以身背肩扛为生的中国苦力失业。但对刘锡鸿这样一个在西方游历颇多的人来说，他应该相当清楚铁路运输的经济利益远远超过其负面影响。⁴⁵

除了有关时局以外，刘锡鸿的文字还涉及到很多其他问题。其中，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威妥玛这个西方人在初见刘锡鸿时以“政在养民”来谈“中国目前急务”，这一儒家思想应该是郑珍及其老师程恩泽都非常赞同的。具体而言，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就是要利用新的技术来改善民生，像秧马、天花防疫还有先进的养蚕技术都属于此类“养民”之术。当然，无论是郑珍还是程恩泽（甚至包括威妥玛）都不会认同政府和社会的所作所为皆当唯“利”是重，但他们也决不会赞同刘锡鸿的想法与作为。刘对新科技的好处视而不见，对中国民众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的现状熟视无睹，只一味强调“中国立教尚义不尚利”而甘愿放弃可能大大改善中国民众生活的“养民”之术，这难道就是他所谓的“宜民”？

郑珍和程恩泽尤其不会赞同刘锡鸿将现代科学贬为是“剥天割地”。因为，十九世纪的知识分子已经有过诸多“剥天割地”之举，其中的阮元就是郑珍的偶像，也是其老师程恩泽的亲密挚友。象阮元，程恩泽和郑珍这样杰出汉学家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理性的探讨常常会得出与固有传统相悖的结论。尽管他们同刘锡鸿一样尊

⁴⁴ 怡和洋行的代表曾和郭嵩焘在郭和刘过夜的地方紫竹林有过一次长谈。虽然郭没有透露谈话内容，但这次谈话很可能是讨论怡和洋行所修的淞沪铁路的命运。参见郭嵩焘：《郭嵩焘日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光绪2，九月十三（公历11月15号，1876），3.63.

⁴⁵ 刘的火车会使中国人失业的论述见于刘锡鸿，《英轺私记》，63页，“始见火轮车”，该文描述了他埃及的Port Said第一次乘火车的经历，还有一些他关于西方人在中国修铁路的陈词滥调。因为西方人不断地向他征询中国未来的铁路政策，刘的回答是：“此我国之内政也。自主之国，他人不得预其内政，尔万国固云然。”这番回答是一位曾作过威妥玛翻译的中国译员告诉他的！

敬中国古代的圣贤，但他们不会简单地盲目崇古。再者，刘自己从未做过汉学的考证，也不是一个重理的宋诗派诗人！⁴⁶

当淞沪铁路竣工时，郑珍已经去世十二年了，我们自然无法确定他会如何看待由于西方向中国输入主要技术而引发的这些早期的争论。但是，我们不妨通过郑珍的学生及姻亲——黎庶蕃（1829—1886）在铁路被拆毁后不久写的一首诗来进行一下合理的推测。1867年黎庶蕃将母亲从贵州移居至南京，因为其弟黎庶昌（1837—1897）当时正在南京作曾国藩的幕僚。之后，黎庶蕃自己也在清朝的盐运中心——扬州出任两淮盐大使。1876年黎庶昌赴驻英大使馆，在郭嵩焘手下任职，其母又移居上海，黎庶蕃便经常往返于扬州和上海之间，照料母亲的生活。⁴⁷ 尽管在黎庶蕃诗的序言里没有提及写诗的具体日期，但我们可以肯定，该诗作于淞沪铁路被拆毁后不久，即1877年底或1878年初。该诗在黎庶蕃诗集中的位置也证实了这一推断，因为黎的诗集是按照创作时间的先后顺序编排的。

火轮车 并序

泰西各国创用铁轮火车，日可行千馀里。光绪初，英人始购华地造铁轨。自上海达吴淞往来才需数刻耳。负重至远莫利於此。余犹及见之，惜今已毁。

终年闭户几蛰虫，砉如野鸟初出笼。买鱼沽酒唤轻策，日斜更欲游吴淞。西洋火车列子御，⁴⁸ 星驰电骛云腾空。又如并刀裂缣素，鸟飞瞥过投烟中。惊麋脱网箭辞弩，轻舟下濂梭无踪。岂独挥鞭失神骏，但怪掠耳号天风。⁴⁹ 云山过眼殊可惜，未辨烟霞深几重。竭来斯须尽百里，城头尚待鸣昏钟。偶然一快亦细事，却思至巧真难穷。世间谁言地可缩，有此更觉天无功。当年出峡差可喜，

⁴⁶ 刘锡鸿把关于热，电，光，蒸汽，化学，天文学的研究称之为“杂技之小”，不能与“圣人之教”相提并论。他的这些关于现代科学的论述参见刘锡鸿，《英轺私记》，65节，128页，“观电学有感”。

⁴⁷ 关于黎庶蕃的生平见龙先绪，《郑子尹交游考》，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17-18页。黎曾在负责盐业专营的六省（河南，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盐政手下任职。

⁴⁸ 据说道教仙人列子可以御风而行。见《列子逐字索引》香港：商务印书馆，1996，“黄帝”2/7/9。《庄子》里也提到列子，本诗的典故可能是来源于此。见下文的讨论。

⁴⁹ 从第九句到此处，黎都在引用苏轼的名诗，详见下文。

一朝千里江陵通。⁵⁰ 犹嫌夷险异忧乐，又况涨落殊秋冬。何如此车胜马力，负重至远皆从同。西方转饷若待此，⁵¹ 悬知易辙三年终。国之利器不自惜，后车失鉴非英雄。⁵²

尽管从序言来看，诗人是有感于淞沪铁路的悲惨结局，“惜今已毁”，故有了下文，但诗的前三句读起来很平常，我们甚至会以为这是一首传统的描写出游乐趣的诗。诗人首先抱怨自己终年闭门家中，然后他买鱼沽酒准备好拐杖要出门。但到了诗的第四句，新意便跃然纸上。虽然太阳即将落山，黎却要出游八十公里！如果这让人惊讶的话，那下面的诗文更令习惯于传统诗歌的读者始料不及。接下来的十二行诗句无疑是诗人对现代技术的赞美，赞美它可以让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八十公里的旅行。黎不再是手持拐杖，缓步慢行于醉人的花树美景之间，而是行驶在令他极度兴奋的速度里，“星驰电骛云腾空”，他仿佛感到自己已脱离了尘世，俨然列子般“御风而行”。当然，在“云山过眼殊可惜，未辨烟霞深几重”这两行诗句中诗人也提到了乘坐这种交通工具的遗憾，即其快速使人无法尽情欣赏美景；但除了这一小小的缺欠，在总体上，黎对新技术还是高度赞赏的。⁵³

对十九世纪的文人读者来说，黎庶蕃的诗除了内容新奇以外，还有一个令人欣喜的特征，那就是他能运用并转换其文学传统来描绘呈现于中国民众眼前的科技新世界。这一技巧使他在古今之间找到衔接之处，并以此展现今与古的截然不同。我们已经提到黎庶蕃引用了神话中的仙人——列子的典故。该典故最早出现于周朝的

⁵⁰ 引用了李白的绝句。详见下文。

⁵¹ 从1874年铁路建设开工到被清政府拆除历时仅三年。从字面看，“转饷”的意思是“运粮”，“易辙”的意思是“改道”，我认为“易辙”在这里是拆毁铁路。我是根据推测翻译这两句诗的。感谢华东师大胡晓明和钟锦教授为我翻译此诗提供的建议。另外也要感谢龙先绪先生的建议。

⁵² 黎庶蕃，《椒园诗钞》卷5，24b-25a页，“火轮车”，在黎庶昌编辑的《黎氏家集》，东京：日本史馆，1888-1889，7-8册。黎崇尚西方的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他曾作诗一首，纪录了1879年美国前总统格兰脱（Ulysses S. Grant, 1822-1885）到访上海。见黎庶蕃，《椒园诗钞》卷6，2a页。“润三月二十九日泰西各国官商为美利坚前总统格兰脱张灯沪渎设水龙之会；余亦往观因记一律。”这首诗的写作日期为公历1879年5月9日。

⁵³ 现代高速交通工具的弊端在郑知同的关于从湖北到上海汽轮旅行的诗中有详细的阐述，在黄遵宪（1848-1905）的后期作品中也有很多记载。郑诗见郑知同，龙先绪编辑评注的《屈庐诗集笺注》，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卷4，170页，“将适余杭乘火轮船先至上海即景四首”。关于黄对此问题的论述见Schmidt, *Within the Human Realm, the Poetry of Huang Zunxian (1848-190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86-191.

《庄子》。该书描绘列子可以“御风而行，泠然善也。”⁵⁴ 此典故在诗中具有双重作用。一是列子的“御风而行”很象乘坐现代交通工具的感觉；同时，这个典故也表现了古今的差异，即古代列子“御风而行”的经验已不再为神仙所独有，如今任何买得起火车票的人都可以对此享受体验一番。⁵⁵

在这首诗中，黎庶蕃用典的双重性更清晰地体现在他对苏轼（1037—1101）最有名的诗“百步洪”的引用上。“百步洪”是苏轼写给他的僧侣朋友——诗人道潜（亦称参寥）的。⁵⁶ 苏轼在诗的前十句中兴奋地描述了他和道潜乘坐一叶轻舟在百步洪顺流而下的情景；诗的后半部（11—22 句）转入对人生转瞬即逝的冥想；最后以道潜法师“多言讵讵师所呵”结束全诗，这句诗用美国学者福勒（Michael Fuller）的解释就是“百步洪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并没有什么特别”（“denying, that as a mere phenomenon, the rapids are anything special”）。这正与佛家万物皆空的思想相吻合。⁵⁷

实际上，黎庶蕃在多处引用了苏轼诗中的词语来描述自己兴奋的体验。下面的对比详细解释了黎对苏轼诗的引用。划线处为黎引用的词语，括号内显示的是这些诗句在各自诗中的位置。

苏轼诗	黎庶蕃诗
1 <u>轻舟</u> 南下如投梭（第 2 句）	轻舟下濂梭无踪（第 10 句）
2 <u>骏马</u> 下注千丈波（第 6 句）	岂独挥鞭失神骏（第 11 句）
3 断弦离柱 <u>箭</u> 脱手（第 7 句）	惊麋脱网箭辞弩（第 9 句）

⁵⁴ *Concordance to Chuang Tzu*.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2/1/19, “Xiaoyaoyou” 逍遥遊。
⁵⁵ 这个典故的第二个作用是与古老的“翻案”技巧和黄庭坚的“换骨”很相似。两种手法都是对原文的推陈出新。
⁵⁶ 实际上，苏轼关于百步洪的组诗共有两首。第一首是写给道潜的，即本文讨论的这首。第二首是写给另一个曾经到过百步洪的朋友，见苏轼《施注苏诗》，台北：广文，1964，卷 5，15—17 页，241—242 页。“百步洪”第一首诗的英译有两个版本，见 Burton Watson, *Su Tung-p’o, Selections from a Sung Dynasty Poe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65-67 and Michael A. Fuller, *The Road to East Slope, the Development of Su Shi’s Poetic Voi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42-244.
⁵⁷ Fuller, *The Road to East Slope*, p. 244. 可能有人会认为鉴于禅不相信推论性语言和思想，道潜不会认可苏轼对佛家哲学的解说。